

近代中國社會結構
和中西文化衝突

主編

張田生

程翌康

宋國棟

982774

11691
<14>

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和 中西文化冲突

主编 张田生 程翌康 宋国栋



22190372

徐州
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

封面设计: 张洪华

责任编辑: 张其晖

近代中国社会结构中西文化冲突

主编 张田生 程翌康 宋国栋

著者: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世华 王世英 刘宗汉

林国宋 朱象璧 陈其南 陈其南

李卫民 李卫民 李卫民

杨朝金 杨朝金 杨朝金

杨朝金 杨朝金 杨朝金

JINDAI ZHONGGUOSHEHUIJIEGOU HE
ZHONGXIWENHUACHONGTU

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和中西文化冲突 主编 张田生 程翌康
宋国栋

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梅陇路130号

南京京新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10.75印张 字数 24万

1989年4月第一版 1989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628-0058-8/C·10

定价: 3.00元

主 编：张田生 程翌康 宋国栋

编著人：（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世华	王世昌	刘洪英
朱 黎	朱世强	宋国栋
李卫民	李世强	李希言
杨朝全	张田生	施耀志
徐勇强	曹寿荣	程翌康

序 言

陈旭麓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近代中国八十年，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它却代表着一种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阶段。在这段风雷激荡的历史进程中，中西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和思想文化的激烈冲突和相互交融，乃至由此而形成的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国内社会生活到对外关系的重大变化，不论在广度上抑或深度上，都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所不可比拟的。我们以往研究这段历史，虽然也取得了不少积极成果，但由于时代大潮的驱使，也由于急功近利的倾向，往往偏重于政治斗争方面的研究，致使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逐渐形成某种固定的是非框架和思维模式，即不论遇到什么事件，什么人物，都爱搞对号入座，常常满足于在革命或反革命、进步或反动、动力或阻力、爱国或卖国、剥削或被剥削、反抗或镇压之间辨别是非，进而作出价值判断。人们习惯于学术上的指导思想等同于政治上的指导原则，把唯物史观等同于历史本身。显然，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欲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前进，就必须勇于冲破这种固定的格局，并扭转“左”的思维惯性。否则，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是不可能出现新的突破与进展。

人类社会是一个多层面的统一体，而历史事实是由无数个互相交错的社会力量相互排斥和相互依存所造成的。在阶级斗

争和民族斗争的交互推动下，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面是宽广的，包括社会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以及社会生活、价值观念、文化观念、道德准则、行为规范、风尚物俗等等，无不处在急剧的新陈代谢之中，呈现出一幅万象杂陈的时代画卷。因此，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应该是多侧面、多层次、多方位的。在中西冲突的进程中，只有从努力从多方面的联系中去探求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和思想文化的演进过程及其后果，才能够实事求是地、全面而深刻地认识昨天中国的国情，为更自觉地建设今天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科学的历史借鉴。

鉴于上述认识，我很高兴地看到《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和中西文化冲突》一书问世。因为，它在上述方面作出了一些大胆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我深信作者的努力将会收到应有的成效。通观全稿，我以为下述努力是积极的：

首先，中国的近代化是在外部世界强力冲击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和中西文化冲突》一书以世界近代化大潮为背景，以中国近代化为主线，从各个不同角度探讨并揭示经济近代化、政治近代化、军事近代化、思想文化近代化的艰难曲折历程。紧扣这一主线，阐述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及其演变，阐述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阐述中国人民及其优秀代表人物对外部和内部敌人的抗争以及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这一主线的自然延伸，势必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相呼应。

其次，本书通过专题的科学组合自然体现中国近代历史自身一定的系统性、完整性、综合性；每一专题都有一定的知识容量，既注意学术上的科学性和内容上的系统性，又考虑它的

时代特色、实际应用和借鉴作用，文字亦通俗可观。故本书对专业或非专业读者来说，不仅在本门学科知识吸取的方向上有较好的导向作用，而且在本门学科知识的应用方面亦有一定的启示。可以想见，这本书对各类、各级党政、企事业干部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的文化素质、理论素质、能力素质的提高，是不无作用的。

最后，还应指出的是研究历史要有时代感。近代中国有屈辱的一面，也有奋起的一面，在屈辱中奋起。今天的中华民族已经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大道上勇猛迈步。但令人不能忘怀的是，世界近代化的大潮曾经使她沉沦，世界现代化的大潮又使她昂首奋起。这本书正是努力论证了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的沉沦与奋起都是以世界大潮为背景而一幕一幕地展开的。它告诉我们，狭隘地对待世界大潮的冲击与冲击下的暂时沉沦，简单地看待两种文明的碰撞与碰撞后的交融，消极地理解中西两种经济制度和两种政治体制的冲突与在冲突下的被迫变革，都不能反映出近代中国的历史真相，只能给读者留下不必要的困惑。唯有把近代中国历史纳入世界时代大潮之中进行透视，并从各个不同角度和层面加以横向的比较研究，才能较为准确地找出近代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及其发展途径和前景。本书围绕这一意向所作出的努力，尽管在内容和立论上还很不尽完美，但作者努力突出这一特色是值得重视的。

1988年11月于沪西长风公园畔

目 录

序 言	(1)
世界近代化大潮中的超稳态中国社会结构	(1)
江河日下的清王朝和被大炮征服后的中国社会	(24)
洋教、洋炮与“西学东渐”	(49)
洪秀全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的破灭	(72)
洋务运动与“中体西用”	(99)
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独特道路	(125)
戊戌变法和俄日两国改革成败之比较	(146)
康有为的传统观念与维新思想的冲突	(167)
进化论的引进和资产阶级维新运动	(189)
孙中山的近代化理论和实践	(206)
近代中国国体和政体的变革	(228)
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中的儒家思想	(253)
对外开放的历史反思	(271)
近代中国对西方政治学说的比较、鉴别和选择	(297)
对日本“激荡的百年史”与中国近现代化的几点思考	(317)
后记	(334)

世界近代化大潮中的 超稳态中国社会结构

张田生

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这种冲突，是以西方近代文明的崛起和中西文化的不同特质及强烈反差为背景的。

鸟瞰历史进程，人类生活方式具有历史意义的改变，已发生过两次。第一次发生在大约一万多年前，人类开始了对植物的栽培和动物的驯养，实现了古代的农业革命，改变了完全依赖自然的生活方式——采集与狩猎，步入农耕社会。第二次则发生在近几百年间，亚欧大陆西部的人类率先打出重商主义的旗帜，进而实现了工业革命，用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生产，又率先跨入近代工业社会。第二次改变，使西方和东方文明的发展，出现了不同的走向，开始分道扬镳。

在 16 世纪以前，中国和欧洲都曾有过发达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农业文明，尤其是绵延几千年之久的中国文明，长期居于世界的前列。勤劳务实的中华民族，在亚欧大陆东部开拓耕耘、生息繁衍，创造了自己灿烂的文化。无论农业水利、陶瓷纺织、建筑冶炼、天文医算、绘画雕刻、哲学教育、文学史学乃至典章制度、国家管理，都有自己独到的成就，在世上大放异彩。万里长城，千里运河，云岗石窟，敦煌壁画，都是当年历史的见证。在中国，不仅出过所谓圣君贤相，出过许多

政治巨人，而且也出过像孔丘、李贽、屈原、司马迁、张衡、蔡伦、张仲景、玄奘、沈括、李时珍这样的文化巨人和科学巨匠。中国文明以她特有的魅力，在当年吸引过许多西亚、东亚和欧洲人的到来。在古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中，中国曾无私地向自己的周边和遥远的西方，传播、扩散自己的文化。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四大发明，在元代开始西传，对西亚和欧洲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吸引力和辐射力，来源于它自身的先进性。而导源于古希腊文明的欧洲文化，在公元5到15世纪近千年的时间里，由于各个封建国家之间的战争、分裂、宗教斗争，发展滞缓。中西文化相比较，直到15世纪，中国依然领先。然而，在第二次巨变到来的时刻，欧洲后来居上，使中国的领先地位受到了挑战。中国对于欧洲，终于出现了由领先而持平，由相持而落后的局面。耐人寻味的是，这个超越和落后的历史瞬间，恰恰发生在史称中国盛世的清王朝前期——康、雍、乾诸朝，其中的原由和教训，历来为人关注。

对于中国的滞后，很久以前有的西方思想家就注意到了。18世纪(1776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指出：“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以及人口稠密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①。”

人们不难看出，西方超越与中国落后的关键是近代化与否。西方的进步和对中国的超出，就在于主动推进并首先开始了近代化，从而比较顺利地实现了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

换。而中国的落后，就在于在这个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没有能够顺应潮流，实现这一转换。在世界近代化的大潮中，中国长期处于一种超稳态的封建制社会结构中，这是一种由完备的封建专制政治，牢固的自给性自然经济和成熟的政治伦理型文化所组成的三维超稳结构。

因而，剖析处在世界历史转换时期的前清中国社会结构，是我们认识近代中国国情，考察近代中西文化关系，揭示中国社会新陈代谢过程的必然起点。

一、欧洲资本主义的崛起和中国封建政治结构的重建

（一）欧洲资本主义的崛起

15、16世纪，欧洲历史的发展出现重大转折，由农本走向重商，传统的封建制度开始衰落。由于生产技术的改进，航海技术的突破，新大陆的发现，世界市场的开辟，引起了社会分工的扩大，加速了城镇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促进了城市和商业的发展。所有这些，培育了近代的市民社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宣称：“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②。在他看来，城市是在封建社会母体中孕育资本主义的真正发源地。可以说，是欧洲的城市，欧洲的市民社会，欧洲的社会结构，在决定着欧洲历史的发展方向，决定着这一转折的到来。

16至18世纪，是世界史上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是世界走向近代化的时期。首先走向近代化的国

家是英国，继而美国、法国等等，到 18 世纪末，近代化已成世界性潮流。所谓近代化，就是使社会摆脱中世纪的封建形态而资本主义化。英法等国的历史表明，近代化的过程，是一个社会生产力、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思想文化全面变革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经历了相当长的自我发展过程和对封建主义的替代过程。以英国为例，它的近代化过程起始于 15 世纪末的圈地运动，是以对农民土地的剥夺，以资本的原始积累为前奏的。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清教运动）对中世纪神学文化的反复冲击，到 17 世纪 40 年代终于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18 世纪下半叶又发生了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是英国近代化过程中两个最重要的里程碑。从“前奏”到第二个里程碑，历时三百年。

如果说，16 世纪欧洲全面展开的资本原始积累，给欧洲带来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繁荣，给 17、18 世纪英、美、法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物质基础，那么，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则孕育了近代西欧文化，改变了欧洲人的心灵和头脑，给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英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它是世界近代历史的开端，是欧洲资本主义崛起的标志。它“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意味着“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③。

（二）中国封建政治结构的重建

东西方历史发展的机遇似乎是公平的。公元 1644 年——甲申年，当英国革命正在进行的时候，中国历史在明朝末年的动荡中，也面临过一次对朱明政权、大顺政权和满清政权的选

择。明崇祯帝朱由检，面对动荡的政局和人们“易子相食”的大饥馑，屡下罪己诏。然而，大势已去，旧的封建统治秩序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李自成和他所指挥的几十万起义的农民英雄，也没有能左右中国的乾坤，建立农民的全国政权，来实现他们“均田免粮”的反封建抱负。而雄居中国东北的满洲人，依仗强悍的八旗骑兵，取得了争战的胜利，建立了新的全国政权——清。

清王朝为了巩固统治秩序，除了向农民让步，实行更名垦荒、轻徭薄赋之类的政策，在政治制度上则承继明制，首先是重建了封建的中央集权政治。这是努尔哈赤的子孙们，在当年所能作出的唯一高明的选择。因而，历史所提供给中国的选择，是有一定余地的。没有非封建化、非君主专制化的余地。明末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在封建士大夫的营垒中，曾发出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呐喊。然而，这种激进的思想，在当时的中国不具备转化为实践的主客观条件，随着清王朝的崛起，便很快被湮没了。

重建后的中国封建政治，其主要内容有三个：空前的集中统一；高度的专制集权；完备的官僚制度。核心是专制集权。

空前的集中统一。清王朝前期的统治，曾经有过一段繁荣昌盛的时期，在政治上建立了一个集中统一的封建大国。自甲申入关起，顺治统治了十八年（1644至1661年），基本上统一了全国。后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这三代历一百三十四年，其中康熙统治六十一年（1662至1722年），雍正统治十三年（1723至1735年），乾隆统治六十年（1736至1795年）。从康熙到乾隆，顺应着历史的要求，逐步实现了全国的统一。1681年，康熙用武力平定了吴三桂等“三藩”，翦除了地方封

建割据势力，统一了江南、西南各省；1683年，兵临澎湖，降服了郑克塽（郑成功孙子），统一了台湾地区；1690至1697年，亲征漠北（今蒙古），三次击败噶尔丹，统一了漠北地区；1720年，派兵护送达赖六世入藏，击败了准噶尔的军队，统一了西藏；1724年，雍正平定青海；1726至1731年，对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废土司制度，改土官为流官，巩固了西南边防；1755至1759年，乾隆遣军入疆，先后征服准噶尔部、平定回部，统一了新疆。

清初统治者，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采取成功的民族团结政策，对周边各省区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建立了一个拥有十八省、五十几个民族，东至库页岛，西至巴尔喀什湖，北至外兴安岭，南至南中国海的强大国家，使我国达到前所未有的集中统一。中国现今的版图疆域，就是康、乾时期奠定的。无可否认，在17、18世纪的亚欧大陆，曾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集中统一的封建帝国。统一国家的重建，对于打破民族割据的壁垒，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使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否则，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中国的前途是不堪设想的。因此，政治上的集中统一并非不好，问题是没有对大陆腹地进行经济上的开发和经营。

高度的集权专制。中国传统的封建国家体制就是：统一（由一个封建王朝统治中国）；中央集权（国家权力集中于中央）；君主专制（中央权力又集中于君主个人）。这一体制，由秦发展到明清，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清较之明，也有新的变化。清在权力集中和政权稳定两个方面，都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

为了加强集权统治，清按照明王朝废除丞相的先例，将六

部（吏、户、礼、刑、兵、工部）直辖于皇帝，各部尚书及地方督抚均由皇帝任免、调遣，各部和各省政务直接向皇帝奏报。中央的一切权力，包括立法权和司法权、政权、财权及军权，全部集中在皇帝手里。皇帝独断专行，皇帝的诰（指示）谕（命令）所向无阻。为适应这种专制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清在满洲族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基础上，于雍正七年（1729年），设立了军机处，其成员一般三至五人，领班军机大臣为满族亲王。军机处总理军国大事，成了皇帝统治下的中央政府的枢密机关。从此，内阁名存实亡。

前清的权力结构，就像一座金字塔，皇帝处于权力的中心点和至高点，具有绝对权威。加上，这几个君主不仅有才能，而且十分勤勉，使得皇帝的个人作用显得格外突出。为了避免“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局面，为了政权的稳定和长久，清代废弃了中国历史上的皇位嫡长继承制，从康熙开始，建立了秘密的皇储制。这就使皇帝有了选择自己继承人的余地，通过对众多的皇子的秘密优选，免除了因皇位继承而可能触发的冲突和动乱。在中外历史上，因皇位继承所引起的政变和战争相当之多。所以，清的皇储制度，在当时条件下，是政治上的一项重要防震措施。

官僚制度，是封建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属于君主专制。中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就是通过层层相叠宝塔型的各级官僚机构，来实施其对城乡人民的统治和管理。官僚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的结合，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的政治结构和政治制度。

官僚机构的完备，是清初官僚政治的一大内容。清代的官制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系统。在中央，可分为三种类型的部

门。第一种是中枢部门，如军机处、内阁、六部等。第二种是一般中央机构，如主管监察的都察院，主管民族事务的理藩院，储备高级人才的翰林院和主持大要案审理的大理寺等。第三种是为宫廷皇室服务的机构，如内务府、太医院等。前清中央机构的设置，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加强了对各级官吏的监察和民族事务的管理，改变了明末贵族官僚及特务机构庞大、臃肿、杂乱的状况。在地方，前清在全国设十八省，并以总督、巡抚为地方大吏。乾隆初年设有八个地方总督和十五个巡抚官署。总督上承皇帝旨意，下统二至三省军政，巡抚则主管一省军政。省以下有府，府以下有州、县，县管至乡、里。整个官僚机构等级森严，自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领正一品官衔，至县，共有正从九品十八级官阶。正是通过这个遍布全国的官僚机构，清王朝精心编织了一张对全国的统治网。

中国历有“官清民自安”之说。很显然，吏治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封建政治的稳定。鉴于明王朝覆灭的教训，清初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曾着手整顿过吏治。顺治就认为，明朝“用人行政，颠倒混淆，以至寇起民离”，“深可为戒”^④。于是，清王朝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官吏考核、奖惩、升迁、黜陟的则例，实行官吏的避籍制度等，企图避免宗亲关系和钱财对用人行政的干扰。因而，清初吏治比起明末还是较为清明的。外戚宦官擅权已不复见，朋党之争也被压抑。为了扩大封建统治的基础，前清沿用了明朝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用仕途引诱和笼络了大批知识分子，增强了其政治结构的稳定性。

剖析前清的政治结构，可以发现其总体上所具有的一些特性：一是浓厚的军事性。前清的大一统和君主专制制度，是在几十年的军事征战中形成的。皇帝统帅的满州八旗兵，是整个

封建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支柱，也是维系大一统的主要工具。在强大的军队支撑下所建立起来的政治结构，具有相当大的力度和牢度。二是高度的封建性。改朝换代后建立的清王朝，只是给中国封建社会带来了外观上的变化和治乱兴衰的循环往复，并没有给社会结构注入新的内容。从社会效果看，前清政治起了稳定统治和繁荣农业经济的作用，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这种稳定和繁荣，是在极力维护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出现的，是推行专制主义的愚民政策、重农抑商政策和闭关锁国政策的结果。它是以剥夺人民的政治、文化权利，扼止城市经济和对外贸易的正常发展为代价的。归根到底，前清政权及其整个政治结构，是适应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要求而建立完善起来的。这种政治结构，同世界的政治近代化潮流相悖。因而，前清政治具有历史的两面性。

二、超稳定的封建经济结构

前清的社会经济结构，从总体上看，是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其明显的特点是稳定。

首先，从历史上来考察。中国的经济结构，在春秋战国之际曾经有过一次大的变动。在当时新的生产力（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推动下，井田制经济逐渐让位于地主制经济，劳役地租的剥削转变为产品地租剥削，初级的封建制经济形态转变为一种成熟的封建制经济形态。这种成熟的封建形态，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从所有制到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形成了自己一系列独特的内部结构。这种结构从汉到清，延续二千年，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尽管中间有过多次农业技术的改进，多次农业经济的繁荣和破坏，多次政权的更迭，都没有导致所有制结